

父亲给未婚妻的诗

□郭 欣

假如,我战死,我战死,
为了我的碧绿碧绿的府河,
和淡蓝淡蓝的的梦泽湖,
姑娘,你莫悲伤,莫悲伤!

假如,我战死,我战死,
请把我埋葬在那小丘顶上,
那苍翠苍翠的松林里,
姑娘,你莫悲伤,莫悲伤!

假如,我战死,我战死,
请为我立一块很小很小的石碑,
刻着:一个年轻人为祖国而战死!
姑娘,你莫悲伤,莫悲伤!

假如,我战死,我战死,
为我的府河,为我的梦泽湖,
我将永远默念着你的名字,
姑娘,你莫悲伤,莫悲伤!

假如,我战死,我战死,
让我静静地躺在故乡的山顶,
让我日日夜夜倾听着你的呼唤,
呵,姑娘,你莫悲伤,莫悲伤……

1942年7月,于鄂中前线

这首《假如,我战死……》是我父亲晏明写给未婚妻邓北野的。邓北野后来成了我的母亲。1942年,父亲毅然奔赴鄂中抗日前线,于战火中写下这诀别诗章,献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桂林,同样置身抗日第一线的未婚妻。如今,七十多年过去了,捧读这首诗,回想父辈那舍身为国的悲壮,仍令我心魂震撼。



晏明

是,遇见了平生唯一一个恋人——邓北野。国家的危难、共同的使命,令他们迅速走进彼此生命的深处。母亲来自河南省滑县,中等师范专科学校的优秀生。一个16岁的柔弱少女竟然独自跋涉千里,来到桂林投身抗日,在前线医院救护伤员。没想到,她还是个文学“迷妹”,写得一手漂亮散文,有不少发表在报刊上。在残酷的战争背景板下,他们的爱情点缀着几许文学的浪漫。两个年轻人憧憬着最终消灭日寇的那一天,喜结连理。然而侵略者的铁蹄跨过黄河,染指鄂中大地。父亲不能忘怀家国之痛,决然惜别挚爱,挺身鄂中。

二

父亲来到湖北省荆州市郝穴镇,这里距日寇第一线哨兵只有十几里。他办起一张《胜利报》,四开四版,周刊,编辑、记者、出版都是他一个人。他认为,唯有身处烽火最前沿,才能迅速报道将士们英勇杀敌的事迹。他走遍战场每个角落,也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。

那天他乘船过江,行至中途,只见日寇开着汽艇追赶而来。日寇高呼乱叫,不停地射击。尽管船老大拼命划桨,但死亡的时刻仍在一分一秒地逼近。最后关头因汽艇的马达坏了,一船人算是侥幸逃生。

一天去采访,突然发现一群日寇从远处迎面而来。父亲立即躲进芦苇丛。日寇在距他不足10米的地方来回巡逻,他不得不在芦苇的泥塘里趴了一整天,直到深夜点燃火把作信号,引来对江的渡船才得以脱险。

父亲有个忠实的“战友”——一匹“高大、剽悍、矫捷”的栗色战马,多次在危难中拯救了他。后来,父亲专门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《我和栗色马——抗日战场上,一个真实的故事》,纪念与栗色马的非凡经历和特殊情谊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以配乐朗诵的形式播出了这首长诗。

有个深夜,父亲骑着栗色马到火线采访,刚进村口就听见机枪扫射声。一位白发老汉突然蹿出栏马高喊:“快跑,鬼子进村了!”父亲还没反应过来,栗色马已瞬间掉过头,发疯似的狂奔,冲出村庄。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追击而来。当一切喧嚣都渐渐消失,栗色马才停下脚步,不住地打着响鼻,像是在庆祝胜利,而



《诗丛》创刊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栗色鬃毛却早已被汗水浸透……

三

在鄂中,父亲采写新闻的同时,还以“抗战诗草”为副题,写了50多首抗战诗歌,许多作品都是在马背上完成的。这首诀别诗《假如,我战死……》就是其一。

尸骨横飞的画面在父亲眼前无数次呈现,战时的邮路完全断绝,挚爱音讯全无——那是他最为惦念、最为放心不下的所在。他用诀别诗对挚爱和祖国作告别,也是对身后所有祈愿作最后的托付。

在家乡湖北省云梦县,父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,他的诗歌很多人都可以张口背诵。诀别诗《假如,我战死……》更是深入人心。云梦县文联主席张赤平撰文说,与众多诀别诗不同,《假如,我战死……》没有选择宏大的战争场景叙事,而是以私语般的温情,构筑了一个即将赴死的战士复杂而真诚的内心世界。在祖国、故乡与恋人之间,诗人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精神坐标,完成了一次对死亡的神圣超越。“全诗不过二十行,却包容了丰富的时代和思想内涵,既庄严又温情,既直面死亡又超越死亡,既关乎民族命运又珍视个人情感。这首诗不仅是诗人晏明对祖国、对挚爱的告白,也是千千万万在前线殊死搏杀将士的告白,短短二十行的诀别诗无愧于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!”

1943年2月,父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告别鄂中,奔赴鄂西恩施,应邀主编《武汉日报》副刊,并与母亲完婚,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了抗日的新征程。

作为后人,我们当然不会忘怀父辈的奉献与豪迈,文学界也没有忘记他们那一代献身者的身影。1995年6月,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,中国作家协会等10个单位联合推选了100部产生于抗日烽火之中、表现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优秀文学作品,这首《假如,我战死……》光荣入选。这,不仅是对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嘉奖,也是对父亲伟大献身精神的最高褒奖。

“七七事变”时,父亲还是个高中生。在学校,他不仅是学生会主席,还担任抗日宣传队队长:刷标语、作讲演、演活报剧……面对国土一片片沦陷,他再也不能安坐课堂。他告别父母,告别湖北省云梦县那简陋的茅屋,投身抗日热潮。

来到武汉,他加入著名的忠诚话剧团,随团到各地巡演抗日话剧—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李秀成之死》《凤凰城》等,唤醒民众。但他发现以诗作刀枪,更为犀利,更能彻底释放自己的爱与恨,于是果断辞别剧团,在出租屋里没日没夜地埋头写诗。父亲的抗日诗歌飞向大江南北,短促、铿锵,像投枪,似利箭。他的长诗《火焰》《惊自忠将军》等更是喷涌着刺目的激情和血色,在抗日战场上久回荡。

1940年,他来到重庆,这里聚集了大批抗日进步文人。父亲有幸结识了郭沫若、老舍、茅盾、臧克家、何其芳等大师级人物,参加了众多抗日集会和活动。刚刚20岁的父亲被奔涌的抗日浪潮一次次淬炼。由于经济凋敝,他在山城找不到工作,常常一两天才吃一顿饭,但仍以初生牛犊之勇创办了重庆第一家诗刊《诗丛》,高扬起一面为民族危难呼号的旗帜。“为抗战而歌,为民族解放而歌”是办刊的唯一宗旨。可惜最终因资金难措,《诗丛》只出版两期便停刊了。但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,仍然奇迹般地珍藏着两套崭新的《诗丛》,留存着这位贫寒诗人青春的印记。

父亲不得不转移到桂林,那是抗日文人另一处聚集地。他不仅结识了更多的诗人和作家,尤为庆幸的

阳光下的行走

□浦 子

这次行走发生在2025年12月6日上午10时50分。晴。

远远的,我就看见陈思和先生和他的学生陈丙杰在那座长廊下等我。陈思和先生的身上洒满了阳光,比阳光更有穿透力的是他那深邃的目光。

他远远地就举起欢迎的右手。我三步并作两步。先生的身子依然挺拔,脸色安然如春。最终,我的目光停留在他拄着一根拐杖的左手。我明白了,如果没有这根拐杖,先生刚才欢迎我的时候,左手和右手大概会同时伸出。

先生一直是用两只手帮扶别人的。2010年10月初,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龙窑》的研讨会在宁海温泉举办。当年还没有杭州湾跨海大桥,先生是当天从上海坐车至杭州绕行500多公里赶来的,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。在他临近中午赶到会场时,留在我记忆里的见面的第一个动作,是他用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双手,说:“浦子,恭喜你!”在下午的会议上,他第一个发言后,与大家一起合了影。下午2时,他便乘车回上海,说是有一批重要客人已经在上海等着了。他当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,后来我才知道,那一天

创作的长处是写民间故事,擅长将民间故事的想象力和现实社会中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起来,由此透露出沉重的文化反思气息。这与我的研究兴趣比较相近。”我的王庄系列长篇小说正是在先生理念的推动下,一部接一部面世的。

先生在左,我在右。我的左手携着他的右手,我们继续向前踱步。先生还和我聊起他最近的一篇文章,文中记述的是他与韩国朴宰雨教授的交往过程。

在小区门口的小酒馆里,先生将酒馆的好菜悉数点上,满桌的菜肴仿佛他满满的温情。用餐期间,我还带给先生一个好消息,我的新书即将出版。

“好,好!”先生说着举了一下双手,像是捧起理想的果实。

我送先生的礼物都是家乡浙东的土产,其中有一小瓶炒花生米。花生是土产的,海苔是土产的,白芝麻也是土产的。这是我爱人来上海之前特意在家炒制的。

先生最后用上海话说:“这花生米,我非常喜欢。”

出了酒馆,离开之前,我最后瞥了一眼先生居住的小区。先生拄着拐杖一直向前走去,“笃”“笃”,拐杖叩击地面的声音清晰可闻。他身前身后皆是跳跃着的阳光。

获悉聂卫平逝世的消息,心绪骤然一惊,跟着便沉了下来。从青丝染霜到步向老境,这些年里,“某某某走了”的讯息听得不算少。每一回听闻,心头总有微澜泛起,那些与逝者相关的往事,会不自觉地在脑海中盘旋。只是从前听闻的,多是疏离之人,岁月过客,纵有感慨,也难生深切的宿命感。也曾从史书与文学作品中,结识过许多跨越时空的灵魂。凝望他们的落幕,品读他们的归期,心绪总会翻涌难平。可这与听闻聂卫平先生这般有过交集的故人离世,心境终究不同。后者是逼着自己,将他人的生死与自身的生命相连,去叩问:生命究竟有何意义?

近年我写过不少怀念友人的文章和诗词,每一次落笔,都是与友人的隔空重逢,亦是与自己内心的深度对话。他们的离去,总让我不自觉地反观自身。就如聂卫平,他以围棋名满天下,我以文字安身立命,我们的人生轨迹本无交集,却因一份共同的热爱——足球,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。

20世纪90年代,我们都是广州《足球》报的特约专栏作者。我曾在报上开设专栏,点评足球赛事,尤其是在1994年世界杯期间,几乎每场赛事落幕,都有一篇专栏文章见报。聂卫平亦与这份报纸渊源深厚,报社曾邀我们同赴广州。有时报社有人来北京,也都设宴款待我们。我们便常聚在一起,或举杯畅饮,或围坐观球,言谈间,说得最多的便是足球。偶尔我会提及围棋,只是我于弈道半通不通,对话自然难以深入。唯有说起足球时,两人都眉飞色舞,全然卸下矜持,畅怀恣意如同孩童。

酒酣耳热之际,聂卫平曾说过一句话,我至今深以为然。他盛赞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确立,认为这份体制的建立与健康运行,远比中国足球队打进一次世界杯意义深远。“这是从根源上推动中国足球向职业化转型的关键一步,”他拍着桌子,情绪激昂,“是真正的筑基之举!”他饮酒是豪饮,带着几分粗放,言语铿锵,常有粗口爆出,那份无拘无束的真性情,格外动人。后来人事变迁,我们往来渐疏,可90年代那些一起喝酒、畅谈足球的时光,始终清晰如昨,时常在记忆中浮现。

这般强悍的人,这股在黑白棋盘上创造无数传奇的英雄,这股曾于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临危不乱、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强者,竟也说走就走了。我不知他晚年染病,在我心中,他始终是那个传奇——即便日有生死对弈,他仍能在酒肆里端起饮用清酒的瓷杯豪饮。那份从容与洒脱,无人能及。

这般性情中人,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围棋,离开了他眷恋的世界,离开了爱他的亲友与万千粉丝。我不禁思忖:生命究竟凭何支撑起那份强大?他曾那般耀眼,那般坚韧,可脆弱起来,竟也这般不堪一击。

这份关于生命强与弱的叩问,早在作家路遥离世后,便曾长久萦绕在我心头。

路遥身形粗壮,五短身材却虎背熊腰,看上去健壮如熊,给人一种坚不可摧、顶天立地的感觉。他能吃能睡,鼾声大得惊人——在五楼就寝,一楼也充耳可闻。谁也不曾料想,这样一个看似打不倒的汉子,会轰然倒下。1992年,西延铁路通车。身为陕北人的他满心欢喜,独自一人背着行囊,登上首趟列车奔赴延安。8个小时的车程,上车时还是意气满满,下车时却已虚弱到无法站立。是延安的友人将他抬下火车,从车站直接送往医院。

在延安医治无果后,他转往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,也是搭乘这趟列车返回西安,由陕西作协的同事从车上抬下,送往病房。那时我已调往北京,1992年11月1日,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,我专程从北京赶往西安探望他。昔日健壮的他,早已瘦弱得脱了形。那一刻,我们百感交集,如柳永笔下“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”的境遇,千言万语堵在心头,终究只剩沉默蔓延。

许久之后,他才缓缓开口,问我曾疗养过的临潼空军疗养院,问那里的条件如何,嘱托我为他引荐。“等出院后,要去那里好好调养。”他语气里藏着对生的渴求,他还要做许多事,还要拥抱这个深爱的世界。可我回到北京没多久,11月17日,便传来了他逝世噩耗,打碎了所有希望。

这些与我年纪相仿、朝夕相伴的人接连离去,逼着我一次次将生死与自身相连,探寻生命的真谛。我终究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,只觉得生命的意义,或许就藏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:是晨起望见的朝阳,是日暮邂逅的余晖;是风拂耳畔的温柔,是蝶舞花丛的灵动;是尝到蜂蜜的甘甜,是感受细雨落在肩头的微凉。春日里,能嗅到青草破土的清冽香气,能沉醉于繁花绽放的馥郁芬芳;冬日里,在雪天行走,能感觉到雪花在额头眉间融化,能看见哈出的气化作一缕雾气。寻常日日,手上扎刺的微疼,眼睛吹进沙尘的不适,这些真切的感知,皆是生命存在的证明。正因为活着,才能体会这份美好与苦涩,才能感知这世间的万般滋味,才算不负这一趟生命旅程。

我向来看重生的质量与做人的尊严。为自己的人生立了一个朴素的标准,六个字:不欺暗,不欺人。对得起自己的内心,不辜负身边的亲友,不亏欠这世间所有的相遇,便已足够。

或许,生命的意义,本就是一场奔赴,一场造物的轮回。我们自尘土中来,从不可知之处启程,在这世间行走数十载,遇见一些人,做成一些事,留下些许值得回忆的片段,最终又将所有情愫与痕迹,归于虚无。尘归尘,土归土,本就是生命既定的归宿。

这浩瀚宇宙,芸芸众生,世间万物皆在自己的轨迹上生长、绽放、凋零。无论是璀璨夺目,还是平淡无奇,都曾真实地呼吸过、活过、感知过。一场生命落幕,便有另一场生命启程,循环往复,生生不息。这,或许就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



隐入黑白尽处

聂卫平怀想
——聂卫平怀想

□白描